

A Cross-Century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Analects*: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 in Ku Hung-Ming's and Annping Chin's Versions

^{1 2}WANG Xunjie ^{2 3}FU Yuqun ¹LUO Xin

¹Tianfu College of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ina

²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³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September 17, 2025

Accepted: October 31,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WANG Xunjie FU Yuqun & LUO Xin. (2025). A Cross-Century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Analects*: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 in Ku Hung-Ming's and Annping Chin's Version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4), 159–165,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4.020.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4.020. p](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4.020)

The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the Postgraduate Innovation Fund Project by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4YCX2011) and Project of Sichuan Provinci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2024 (SCJJ24ND122).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ransknowletology,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processes of knowledge “selection,” “processing,” and “modification” in the cross-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of *The Analects* by two Chinese translators, Ku Hung-Ming and Annping Chin. It explores their mechanism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reveals the distinctive expressions and orientations of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 in their translation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Ku Hung-Ming, situated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amid intense Sino-Western cultural encounters, employed English as a medium and adopted strategies of omission and simplification to bridge cultural gaps, reflecting a target-culture-oriented mod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contrast, Annping Chin, working 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academic pluralism,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and extensive annotations to reorganize and reinterpret the knowledge of the book, demonstrating a text- and scholarship-centered reconstruction approach. The two translations, shaped by differing temporal and translational purposes, embody diverse path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ogether constitute important mediations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Analect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underlying patterns of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discourse power in classical text translation, offering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Confucian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knowletology.

Keywords: Transknowletology;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Ku Hung-Ming; Annping Chi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WANG Xunjie is an assistant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Tianfu College of SWUFE,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His email is wxjlovegy@outlook.com. FU Yuqu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master's supervisor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WUST. Her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medio-translatology, transl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and 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Her email address is yuer_tea@163.com. LUO Xin is a research assistant at the Applied Language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chool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Tianfu College of SWUFE,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Her email is 2869611403@qq.com.

跨世紀《論語》英譯： 辜鴻銘與金安平譯本知識重構初探

^{1 2}汪勳傑 ^{2 3}付玉群 ¹羅 鑑

¹西南財經大學天府學院; ²西南科技大學; ³西南交通大學

摘要:本文以知識翻譯學為理論框架,對比辜鴻銘與金安平兩位華人譯者對《論語》進行跨語言知識『選擇』、『加工』與『改造』的重構過程,探討不同時代背景下的知識生產機制,揭示兩個譯本在知識重構中的差異表現與譯者取向。研究認為,辜鴻銘立足於晚清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語境,以英語為橋梁,通過刪減名物、化繁為簡的翻譯策略消解文化隔閡,體現目的語文化導向的知識生產特徵;金安平則置身當代全球化與學術多元化背景,結合歷代經解成果,以細緻的註釋與索引重組《論語》知識,呈現以文本與學術規範為核心的重構取向。兩種譯本在時代條件與翻譯目的的差異中展現出知識生產的多樣路徑,共同構成《論語》世界化進程中的重要譯介環節,為知識翻譯學視野下的儒典英譯研究提供理論啟示與實踐參照。

關鍵詞:知識翻譯學;《論語》英譯;知識重構;辜鴻銘;金安平

基金項目:本文為西南科技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資助項目『星火計劃:儒學譯介研究』(24YCX2011)階段性成果;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2024年度項目『道家哲學對21世紀西方前沿生態詩學的影響研究』(SCJJ24ND122)階段性成果。

一、引言

從譯介發生、典籍語言旅行到在異域文化中的傳播,典籍知識譯介大致分為生產、轉化、重構、推廣、傳播等環節。學界目前主要探討知識的生產和轉化過程與推廣和傳播途徑。『知識重構』是二者的中間環節,是知識生產和轉化的成果,也會對知識的推介與傳播產生巨大影響。『翻譯的本質就是關於他者的地方性知識,經由陌生化學習、選擇性吸收和創造性重構而成為普遍性知識』^①(楊楓,2022a:1),翻譯過程中的『知識重構』是一個重要領域,值得進行深入探究。

《論語》至今有40余部英譯本,譯介時間跨度大,譯者身份各異。其中,辜鴻銘和金安平的《論語》英譯本分處於近代與當代,均是影響力較大的典型譯本,兩位譯者都有著華人身份屬性。無論時代如何變遷,



『華人新移民是中國文化典籍和知識話語在海外擴大影響的重要力量』^②(胡安江,2022:17)。因此,對比二人的譯本對於典籍的譯介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本研究著重探討兩個譯本在知識生產與重構層面的異同與特徵。相較於直接比較譯本的譯語差異,本文更關注譯者如何在翻譯過程中進行知識的再生產與創造性重構,並從文本層面揭示這一過程的具體實現。

知識翻譯學為此研究提供了理論依據。作為探究跨語言知識加工、重構與再傳播的理論框架,知識翻譯學有助於分析譯者如何將典籍中的知識轉化為跨文化語境中可理解的現代知識。本文旨在運用該理論,分析辜鴻銘與金安平兩個譯本的知識生產與重構過程,關注其文本表達、語義選擇與文化詮釋策略,從而揭示二者在知識重構過程中的共性與差異。通過此研究,可初步總結兩位譯者對儒家典籍知識的重構『選擇』、『加工』、『改造』,並為後續探討其知識重構範式的比較研究提供理論與實證基礎。

二、知識翻譯學

知識構成翻譯既以知識為翻譯研究的中心,又回歸知識的本質探討,這一理論運用於文本分析的核心在於釐清知識的分類,探討知識與翻譯的關係。『知識翻譯學』從知識介入翻譯,『知識』既是基礎,也是對象,還是旨歸,同時也是『方法』,具有方法論意義^③(孟祥春,2022:57),通過探究知識與翻譯的關係及對知識合理分類的方法,能夠闡釋知識翻譯學的理論應用基礎。

(一) 知識與翻譯

知識在語言之中,『知識就在於使語言與語言發生關係,在於恢復詞與物的巨大的統一平面,在於讓一切東西講話』^④(福柯,2020:43),人們的思想觀念和情感價值都要通過各種語言進行表達,知識組成各種信息見證著詞與物產生聯繫,又在翻譯中完成一次次的文本旅行。『知識翻譯學秉持客觀意義上的知識論,主張知識就是人在生活實踐中獲得的對世界的認識與經驗,構成人的生存需要與生活積累的意識化、符號化和結構化的信息工具』^⑤(楊楓,2022b:1),地區、國家之間的認識與經驗在世界中存在交互轉化的需要,承載各類信息的知識正是通過翻譯才得以廣泛傳播。

從歷史維度看,也翻譯的存在讓《論語》知識不斷豐富發展。『翻譯是地方性知識世界化的過程,翻譯使不同語言承載的不同知識成為世界公共財富』^⑥(楊楓,2021a)。知識翻譯學對翻譯的理解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其認為翻譯不只是語際轉換或信息溝通,更是文化行為和社會實踐。『翻譯就是知識的翻譯過程、行為以及最終結果』^⑦(嚴程極、楊楓,2022),其本質始終要落腳於知識的一系列生產與傳播過程。

基於知識翻譯學理論,可以從三個方面歸納知識與翻譯的關係。從語言互動的角度來看,『知識就是不同語言之間相互定位、相互闡釋和相互影響之後的翻譯實踐』^⑧(楊楓,2021b)。而翻譯是不同語言之間相互轉化、相互寫照、相互化用的知識生產實踐。從譯者行為動機的角度來看,知識是感知與認知等活動的結果。而翻譯實踐是『知識的地方性與世界性的對話』的過程。從文本變遷的角度看,知識通過翻譯活動得到『加工』、『重構』和『再傳播』,而翻譯實踐活動在『語言轉換』、『話語塑造』、『知識構建』的過程中形成策略和方法。『知識既是翻譯的所有存在,又是翻譯存在的目的;知識既是翻譯的理論,又是翻譯的方法』^⑨(楊楓,2022b)。總之,知識是翻譯文本的轉化對象,翻譯是知識重構的過程,二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故而本文將運用這一理論深入對比研究《論語》英譯本。

(二) 知識的分類

譯者處理不同類別的知識,所採用的語言轉化策略有所不同。『譯者所鑑定譯文的知識類型決定了最

終的翻譯模式』^⑩(嚴程極、楊楓,2022:43),知識翻譯學將知識分為自然科學知識、社會科學知識和人文科學知識。知識翻譯學作為一種新理論,以典籍作為研究對象的實踐較少,本文以兩本《論語》英譯本為研究對象展開比較研究,探究隱匿於經典文本背後的知識重構問題。

根據知識翻譯學對知識的分類,知識的類型分為自然科學知識、社會科學知識和人文科學知識三種類型。《論語》文本內容所涉及的知識屬於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因為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包括哲學、語言、歷史、民族、文化、文學、社會、國家、經濟、法律等複雜現象和元素,以解決人的精神活動和社會問題為目標,涉及認識、評價、改變等經驗、價值功能,決定了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翻譯是「知識重構」,可以反思、批判、闡釋和建構』^⑪(楊楓,2022b:2)。運用該理論,能深入探索《論語》英譯本中有關社會秩序構建和人類命運管理知識的重構模式,展現《論語》的當代價值與活力。

三、辜、金譯本知識重構比較

知識生產離不開文化環境和歷史背景。『知識翻譯學聚焦地方性知識向世界性知識的生產變遷,把翻譯置於不同知識共同體的歷史視野和格局下考察』^⑫(楊楓,2021b:2)。在探討《論語》從中國知識體系走向世界知識體系的過程中,文化環境與時代背景的影響至關重要。辜鴻銘和金安平的《論語》英譯本誕生時間跨越百年,兩位譯者分別置身於不同的文化與學術語境之中。這種時代跨度使兩個譯本成為觀察中國典籍知識如何在不同歷史語境中被生產、轉化與重構的理想個案。

本文分析辜、金譯本對源語信息的『選擇』、『加工』與『改造』的實踐和經驗,從知識重構層面考察兩位譯者如何以其文化立場、學術訓練與語際理解,完成對儒家思想的再生產。由此,《論語》知識重構的過程與脈絡將會更加清晰。翻譯『從來不只是語言轉換的簡單過程,而是與知識和權力的生產機制緊密聯繫在一起的』^⑬(金學勤,2009:8),《論語》在翻譯時的知識生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中國文化話語權的形成,知識重構方式影響話語權力的大小。在辜鴻銘與金安平的譯本中,譯者作為知識生產的主體,通過翻譯實踐參與了中國文化話語的重構與再生。從時代不同,知識背景相仿的兩位華人譯者所譯的《論語》切入,能夠探究譯本背後的知識生產機制,比較其異同,分析譯本『知識重構』的成就與不足,為《論語》英譯研究提供新思路。

(一)《論語》英譯本

《論語》至今約有 40 多個英譯本,最早由約書亞·馬士曼 (Joshua Mashman) 於 1809 年翻譯出版。1938 年,英國散文家亞瑟·韋利 (Arthur Waley) 的譯本是目前廣為流傳的譯本之一。1998 年,安樂哲 (Roger T. Ames) 和羅思文 (Henry Rosemont) 從中西比較哲學視角合譯《論語》,出版了『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2007 年,華茲生 (Burton Watson) 翻譯出版了其行文簡潔,語言優美的譯本。這些譯本各具特點,受眾廣泛。後來的新譯本,在翻譯的準確性上,與早期譯本各有千秋,難分軒輊,但是在文字風格上卻顯著出現通俗化的現象,反映了現代讀者群閱讀接受性的變化^⑭(鄭培凱、鄃秀,2018),讀者群體接受性的變化主導知識重構的歷史變遷。在眾多《論語》譯者中,辜鴻銘和金安平有著相似的身份和知識背景,他們都是海外華人,精通中外語言文化,對儒家學術有著深沉熱愛與高超的造詣,因此,對他們的英譯本:『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與『The Analects (Lunyu) :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Annping Chin』進行比較研究,可以窺見共性與差異,分析知識重構過程,總結知識重構策略。

(二)譯本知識重構過程

新興理論為尚待考究的問題提供了新的研究視野和格局。『知識翻譯學科學分析不同語言面對不同知



識如何選擇、加工、改造的實踐和經驗及其語言轉換、概念生成等知識生產和傳播的文化背景、社會條件和政治環境』^⑯(楊楓,2021b:2)。《論語》知識的世界性傳播從何時發端雖已無從考證,但從英譯本中探究其知識如何經過『選擇』、『加工』、『改造』走向世界,仍可再現其知識重構過程,明晰譯者對同一知識進行差異化重構的始末。

1. 選擇

對知識內涵的斟酌、取捨與選擇是譯本之間產生差異的根源。『大部分知識屬於隱性知識,並在很大程度上局限於知者(the knower)只有很小一部分知識能同他人分享』^⑰(嚴程極、楊楓,2022:41)。辜鴻銘既是將《論語》一書理解為廣博而多面學術體系的知者,也是將書中知識內化為翻譯基礎與能力的譯者,他認為理雅各在英文刊物上發表的《中國經典》譯文欠佳,儘管他在漢學方面樹立了權威,但是他只是瞭解中國典籍的一點『死知識』(dead knowledge),他的譯文讓人覺得奇異怪誕,無法理解中國人真正的德才。

正是基於對理雅各譯文的批判,他選擇努力按照一個有良教英國人的思維表達方式,來翻譯孔子及其門生的言論。『他的文學修養達到了普通外國人難以企及的高度,為其日後用優美的英文著述和翻譯儒經打下了堅實的語言基礎』^⑱(金學勤,2009:70)。其實辜鴻銘的中文作品極少,他對中文,特別是古代漢語的理解遠不及英文水平。而正是因為他高超的英文文學造詣和語言能力,才導致他的譯文以一種高度概括總結的形式呈現(比如頻繁使用代詞『it』),這正是王國維批評他用空虛廣漠之語翻譯典籍的原因之一。他是在受馬建忠影響之後,於張之洞幕府擔任幕僚時期,才具備中文和國學造詣。再將其對《論語》文本所展現的豐富內涵,用流暢的譯文表達出來。他對於文本意義的闡釋基於潛心研學中國典籍過程中的『隱性知識』(tacit or implicit knowledge)沈澱。

金安平專注於梳理分析歷代學者對《論語》原文釋義產生分歧和爭議的地方,先基於一種經解翻譯原文,再在評註中提供多種經解,最後給出選擇一種或綜合多種經解的原由。她並不評判哪一種是最佳解讀,而是激發讀者去感受、探索、甄別。金安平秉承清代學者劉寶楠註疏集釋的方法,以兼容並蓄又不失嚴謹考究的學術規範,對《論語》進行翻譯和評註。『清代經學家在經書文字的解釋和名物制度等的考證上,超越了以前各代,取得了重要成果,這對我們利用經書所提供的材料研究古代的經濟、政治、文化、思想以至科技等,有重要的參考意義』^⑲(劉寶楠、高流水,1990:1)。《論語正義》中的經解究溯歷代章句字詞流變演化,疏證以明義,結構條分縷析,內容豐富詳實,不僅是金譯本釐清文本意涵的重要參考,其不作褒貶取捨的集釋方法也為當代譯者評註《論語》提供了一種合理的譯介選擇。隱性的『活知識』(live knowledge)和集釋的『廣知識』(extensive knowledge)是辜、金譯本在知識層面上的『差異化選擇』,前者內化中西文採所長,自成一家之言。後者超越歷代紛紜臧否,尋求多元闡發。

2. 加工

加工是知識重構的中間環節,是選擇知識之後,對知識進行系統化的梳理、分類和轉化的過程。『知識闕無』(knowledge void)也是知識差異的一種表現形式^⑳(孟祥春,2022:61)。《論語》中有著大量的專有名詞與豐富的術語,是譯者需要克服的『知識闕無』,在翻譯時,譯者需要考量所譯知識是否需要加工,以及如何進行加工。辜鴻銘雖鍾愛儒家思想,卻未採用孔子『名從主人,物從中國』的譯名主張,他的結論是:『為了盡可能地消除英國讀者的陌生和古怪感,只要可行,我們都盡量去掉所有那些中國的專有名稱』^㉑(辜鴻銘、黃興濤,1996:346)。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折損了原文本豐富的名物文化內涵。『他老人家將原文中大部分古代『人名』、『地名』乃至『國名』和『器物名稱』幾乎都刪而不譯。這是辜老為了突出原著哲學思想而捨棄『細枝末節』的一種翻譯風格。但看到他將這些蘊藏著豐富內涵的史地專名刪去,我不免心生惋惜』^㉒(辜鴻銘、王京濤,2013:2),但這種做法也是當時中國思想文化鮮為西方所知的時代所迫,即最大程度的刪減加工,隱化中西知識差異,避免文化認知障礙,在打破傳教士壟斷儒典譯介話語權方面,取得了

極大成功。

對於這些專有名詞，金安平的加工方法是：『專名在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在註疏中做詳細的描述，再次出現時就加註』^②（金安平，2019：iii）。金譯本在評註中，結合全書互有關聯的章節內容，對孔子及其弟子的性格特徵加以推論，對某一古典概念加以鉤沈。以期讀者能對某個人或概念形成自己的結論。在正文前她附上了中國朝代表，為《論語》中涉及的朝代和歷代學者的背景提供了時間線索。另外，她還在正文後提供了大量的索引，供讀者快速檢索文中信息，包括孔子弟子與歷史人物、術語與議題、中國學者和思想家。這些索引分類合理，內容全面，為閱讀提供極大便利。這種精細加工副文本的知識重構過程是讀者構建起儒家思想知識體系的關鍵助力。如讀者可通過文本中所有對於『性』、『知』、『禮』的討論，形成對相關話題、人物的全面認識。

從不同的歷史視野考察，譯者受時代因素的影響，對知識的加工方式迥異。辜鴻銘專注於從《論語》文本中提煉要義，捨棄可能影響讀者接受的名物術語，最大限度的消除讀者的文化疏離感。而金安平則以評註加副文本的形式，豐富原文本信息，力求傳達出關鍵人物和概念的全貌，讀者若深究，不會陷入一知半解的境遇。總而言之，《論語》的知識加工方式和過程取決於時代因素和翻譯目的的差異。

3. 改造

勒弗維爾（Andre Lefevere）認為翻譯是一種改寫（rewriting）。一種在有意無意之中按照某個特定時代的特定規範而進行的改寫活動^③（金學勤，2009：9）。而在文本改寫的過程中，知識也同時被改造，改造的合理性需要控制在『信』的範圍內，否則便會失真。從社會符號學翻譯觀來看，知識的改造目的在於克服表達形式差異，讓譯文盡可能的做到與原文『意義相符，功能相似』。

具體來說，辜鴻銘的知識改造強調引用名論：『為使讀者對文本蘊含的思想本質理解到位，我們還加了一些注釋，引用了歐洲名家的言論，喚起這些歐洲讀者所熟悉的一系列思想』^④（Ku, 1898: viii）。此外，他還引用了《聖經》注釋《論語》，通過語義近似的文本內容加註，原文的知識和意義雖發生錯位變化，但巧妙地拉近了英語讀者與中國文化的距離。『對源文本蘊含的知識和意義進行語言形式上的變更和改編，以適應目的語文化語境的知識訴求，我們稱之為改造模式（modifying mode）』^⑤（張生祥，2022：63）。他通過異語思想文化對原文本知識進行改造的模式，無形間削弱了源語知識作為獨立知識存在的個體性，這種知識重構對目的語知識的依賴性大，卻是激活讀者相似知識記憶和閱讀興趣的捷徑。

金安平的知識改造側重於辨析。《論語》微言大義，其經解意義的多樣多元，分歧差異巨大。而譯文卻只能基於一種理解或闡釋表達，這就需要在繁雜的經解中進行辨梳，對比改造經解知識，為讀者的理解鋪平道路。在譯本說明中，金安平寫道：『此譯本傳承了近兩千來年的中國學術研究和四百年來西方轉化《論語》語言的嘗試。為了翻譯出一個既新穎又忠實於原文的譯本，我的翻譯工作基於不同學者和讀者得出的成果之上，他們個人背景不同，所處的歷史環境各異』^⑥（Chin, 2014: xxvii）。在各家之言中，將文本知識甄選提煉是金譯本知識改造的最大特色。

語言和文化差異是改造知識的必要條件，對比兩位譯者的知識改造過程，可以看出，辜譯本始終立足文化，傾其所學，以西釋中，在中西文化概念之間牽線搭橋。金譯本立足文本，以中述中，通過改造經解完成語際轉換。譯者對作者、讀者、文本的不同側重產生了知識改造方式差異。

從知識的『選擇』、『加工』和『改造』三個方面分析譯本知識重構過程，有利於明確譯者的知識取向，探究知識重構的內在規律，從而進一步探索此過程中譯本的知識變遷與知識影響力。

四、結語

作為第一個向西方譯介儒家經典並產生巨大影響的華人，辜鴻銘在特殊的時代語境下，不遺餘力地加

工改造《論語》，努力削弱中西文化之間的隔閡。西人受知識差異所限，為了使其更易進入《論語》的思想世界，不惜刪減術語、化繁為簡，最大程度上實現可讀性。辜鴻銘的翻譯不僅是一種語言行為，更是對儒家思想的再詮釋與文化立場的自我表達，其譯文中的『選擇』『加工』『改造』構成了一套以『文化說服』為核心的知識重構路徑，體現了他以目的語文化為中心的知識重構取向，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傳教士壟斷儒典譯介的話語權。

而隨著中國深刻影響世界，《論語》英譯和現代儒學不斷發展，深入理解《論語》成為時代需要。金安平立足於新的學術環境與知識生產條件，通過系統的註釋與索引設置，精細化處理詳解《論語》中的人名和術語，讓書中人物形象更加立體鮮活。以經解著作為參考對象，將《論語》豐富內涵和盤托出。在一系列的選擇之後，綜合歷代經解成果，強調譯文的可考性與多義性。她的譯本側重『評述』，以評註與副文本為載體，實現知識的系統化加工與多元化展示，其重構策略體現了當代儒學英譯的學術規範取向與理性闡釋精神。

兩個譯本在『選擇—加工—改造』的層面各有側重，形成了兩種互補的知識重構過程。相比之下，辜譯本強調文化感召力與思想感染力，代表了《論語》早期英譯的主動建構階段；金譯本則注重學理精確與知識呈現，體現出當代英譯對原典語義的細讀與再生。二者在時代語境、翻譯目的、知識取向上的差異，共同揭示了《論語》知識從『文化再現』到『學術再構』的歷史進程。在此研究基礎上，未來可進一步探討兩種譯本在知識重構範式上的差異與共通性，即譯者如何通過不同的策略、話語立場與學術方法實現《論語》知識的再生產。此比較不僅有助於揭示中西知識互構的動態過程，也為知識翻譯學視野下的典籍英譯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撐與實踐參照。

注釋

- ① 楊楓：《知識翻譯學：出發與抵達》，《當代外語研究》，2022年第5期，頁1-2。
- ② 胡安江：《知識考古、話語重構與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美國漢學家華茲生的中國典籍英譯研究》，《當代外語研究》，2022年第5期，頁12-21+161。
- ③⑨⑩ 孟祥春：《『知識翻譯學』命名與概念構建》，《當代外語研究》，2022年第3期，頁55-64。
- ④ 福柯：《詞與物——人文科學的考古學》，上海：三聯書店2020版。
- ⑤⑨⑪ 楊楓：《知識翻譯學的翻譯定義與分類》，《當代外語研究》，2022年第1期，頁1-2。
- ⑥⑧ 楊楓：《翻譯是文化還是知識》，《當代外語研究》，2021年第6期，頁2+36。
- ⑦⑩⑯ 嚴程極，楊楓：《知識翻譯學的知識淵源》，《上海翻譯》，2022年第6期，頁39-43。
- ⑫⑯ 楊楓：《知識翻譯學宣言》，《當代外語研究》，2021年第5期，頁2+27。
- ⑬⑭⑯ 金學勤：《論語英譯之跨文化闡釋：以理雅各、辜鴻銘為例》，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版。
- ⑭ 鄭培凱，鄒秀：《論語英譯的風格變化》，新時代語境下翻譯研究與外語學科建設新方向高層論壇，西安外國語大學，2018年。
- ⑯ 劉寶楠（著），高流水（校）：《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版。
- ⑰ 辜鴻銘，黃興濤：《辜鴻銘文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版。
- ㉑ 辜鴻銘，王京濤：《西播論語回譯：辜鴻銘英譯論語詳釋》，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3版。
- ㉒ 金安平（著），鄒秀（譯）：《論語英譯及評註》，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版。
- ㉓ Ku Hung-Ming. (1898).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 ㉔ 張生祥：《基於知識翻譯學的翻譯研究與知識轉化》，《當代外語研究》，2022年第2期，頁58-67。
- ㉕ Chin Ann-Ping. (2014). *The Analects.* New York: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